

考古學專刊
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
研究報告

馮家昇著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中國科學院出版

B949

F62

考古學專刊

丙種第一號

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

研究報告

馮家昇著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中國科學院出版

1953年6月



A0520359



本書內容提要

1930年回鶻文寫本三藏法師傳在新疆出土，旋為北京圖書館所收購。1932年納粹德國人設詞騙走柏林，經種種交涉，終於1946年復歸祖國的懷抱！1951年春，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請馮家昇同志整理與編輯。至秋大書影印問世。

這本研究報告是馮同志在整理編輯後寫成的。內容分九部分，約三大類：其一，為回鶻文奘傳的一般敘述；其二，為對研究本書的一些指示；其三，是特別研究。

東西學者自來以為回鶻人在鄂爾坤河流域時代所用的文字只是古突厥文，如世所知的英武威遠毗伽可汗碑，九姓回鶻可汗碑；但馮同志却指出回鶻人在當時可能已有兩種文字：一種是古突厥文，一種是據粟特文而創製的文。這話很正確，最近蘇聯科學院出版的“突厥語言集”有伯恩斯坦的一篇文章說，在新發現在的古錢裏有五個字，這五個字就是我們所說的回鶻文。其時代在紀元後第八世紀，當回鶻的盛世。

回鶻文的起源，東西學者自來有兩種說法：其一，出自敘利亞文；其一，出自粟特文。馮同志則主張第二種說法，並列舉理由。回鶻古語文法，知之者絕少，馮同志先論其梗概，後於每句分析其字根、語尾，使讀者一見瞭然於回鶻語文的構造。

通常我們對於古突厥系民族的紀年法，只知其一二；馮同志則系統地說明它的三種演變：第一時期只用十二獸名，第二時期加上干支，第三時期加上數目字。而這種演變俱受漢人的影響。

用回鶻字母寫出來的漢字，早年由繆勒文裏知道三五個，1938年葛瑪麗舉出十來個；今次本書的著者則舉出一百多個。這對於研究古代西北方言有很大的幫助。



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 研究報告

一. 編 輯 經 過

回鶻文寫本“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或茲恩傳” bodistw tāto samtso ačari-nīng yorīy-īn uqitmaq atly tsī īn čuīn tigmā kwi nom bitig 即“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北京圖書館藏。此書係一九三〇年清華大學袁復禮教授在新疆工作時購自迪化的一個商人。原來埋在地下，一九三〇年前後出土。出土的地點不明，商人恐被官家沒收，不說出原書來歷，只說是南疆出土。商人因易於出售及賣錢多，故意把書割裂，竟使一部完整的書散落四方，真是可惜^[1]！

據我所知，這書原分散在三個地方：一部分由袁復禮教授採購得，攜還北京，售於北京圖書館，凡二百四十二葉；一部分由海金 Joseph Hackin 在由敍利亞至北京途中購得，共八葉，後交格瑪麗 Annemarie von Gabain，今已歸北京圖書館收藏；另一部分巴黎癸梅 Guimét 博物館經伯希和介紹，由商人購得，共一百二十三葉。但把以上三部分拼合起來，仍不能湊成完書。

一九三二年，格瑪麗由北京圖書館把所藏的這一部分借走，七七事變前，北京圖書館直接去信催還，又間接通過法西斯替的德大使館催索，格瑪麗皆置之不理。抗戰初期，又曾設法追索，仍無結果。直到一九四六年，經過種種困難，這一件流落異邦的重要文物才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一九五一年一月間，北京圖書館和北京大學東方語文系要我在兩三個月以內把這些殘葉按照順序整理出來。當時我覺得這個任務不太困難，因為有人說這些殘葉已經格瑪麗整理過了；殘片上並註有號碼，兩三個月以內總可以完成的。不料看到原書後，才曉得所謂“整理”只是用藥水將摺疊粘結之處弄得平整，所謂號碼只是登記號，而不是書的順序號。我擔承了這件任務後，雖說半天去北京圖書館，半天回科學院工作；可是實際上全副精力都擺在上邊了。每天前半天去圖書館把殘片的文字用羅馬字母錄下，下午回科學院，晚上回家，則研究其意思，並

查找有關中外書籍。常夜至十二時以後入睡，早四五時起床。這樣繼續了幾個月後，僅僅搞出四十多葉，八十多面。若將二百餘葉整理出來，則非兩三倍的工夫不可。遇到殘片大一點的，字數多一點的，還好辦；遇到殘片小而字數又少的，則費力甚大。平時我們遇到過去熟讀的廿篇論語殘字“也已子曰”，想找出它的卷葉來，也還不容易；在這樣人人不熟習的十卷茲恩傳裏，其中類似“也已子曰”的真不知有多少！遇到殘片是敍事的也還好處理；遇到譯自四六俳偶的贊偈或講佛家哲理的地方，那就費氣力了。另外一些物質條件的不夠，也使工作不能迅速完成。譬如直到現在還沒有一部完備的古回鶻文字典^[2]，有關的參考書也缺乏。到了三月底，我想既然不能在預定的時間完成任務；那末，依照格瑪麗的登記號碼編排起來，對研究的人也有方便之處。

只就格瑪麗的登記號碼編起來也是不容易的一件事。這二百多殘片弄得亂七八糟，在一些地方用一種號碼，在另一些地方又用另一種號碼。還有一片有兩種號碼的。這些不同的號碼如不費些工夫研究出來，是不能編的。如寫 H 的一共有八片，費了好多工夫不明所以，後來看格瑪麗的“玄奘傳回鶻譯文”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 Hüen-tsangs^[3] 的序文，才豁然領悟那就是海金給格瑪麗的八片。但誰能想到被外國人攫走的古寶會復歸祖國呢！

原書長約十八吋，寬約七吋，紙質麻製，極厚，呈褐黃色。紅格。書的左方紅印上有圓洞，是作穿葉用的。鈔寫的極工整，乍看似乎是木刻的。每面二十七行，每葉五十四行，每行字數多少不一。寫的次序是自上而下，由左到右。每葉後左邊原有小字回鶻文，注明書的卷葉；今皆剝落，存的不過七八處。卷首語和卷尾語尤多不存。二百多葉之中，僅二十三葉是完整的，其餘皆是破碎片。所謂完整的二十三葉，前後上下總缺一平行或幾個字。格瑪麗在一九四八年寫的“回鶻文玄奘傳中的信” Briefe der Uigurischen Hüen-tsang-Biographic^[4] 是據本書葉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而成，首尾行有的剝落很難識，但可復原；今檢視原行剝落已甚。可識的已不可識，不可識的則更不可識了。書的紙質很厚，本不易破；但出土後為空氣所侵蝕，十分脆弱，人手一觸即落。二十年來由於人手的接觸，不知已經剝落了多少！今幸而人民政府重視少數民族的歷史文物，把它編印出來。如再過幾年不理，其損傷就不知要到了何種程度！

回鶻人是今天維吾爾民族的祖先。今天我們要寫維吾爾歷史，而只靠現有

的材料，是絕對不夠的。寫當時的歷史，必據當時的材料，才能正確。回鶻文材料藏於今日各地的圖書館和博物館，大多是些宗教經典；歷史材料很少。然而就是這些很少的材料，如果能把它一一翻譯出來，對於寫維吾爾歷史是有莫大幫助的。詳古譯的茲^[5]恩傳與維吾爾歷史無關；然而從此也可以考見維吾爾祖先的文字與語言的一般。如以此書為起點，更進而搜求其他回鶻文史料，把它翻譯出來，加以研究，那末，今天對此書的翻譯與研究也是有價值的。

1.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我寫信給袁復禮教授，問他那裏買的以及本書初到手的情況。三十日，他覆了我一封信。
2.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目錄列有四五種華夷譯語，解放前經前語言所提到南京；北京圖書館有兩三種也運走，只留下明板清印的一種，以及東洋文庫攝影本一種。明本有七百餘字，東洋文庫本僅二百餘字。Brockelmann 的 *Mitteltürkische Wortschatz nach Mahmud al-Kashyaris Divan Lughät at-Türk.* 1928, Budapest 是據亞拉伯字母寫的回鶻語言，而又用羅馬字母傳寫出來的。不過幾千字，還是不夠用。W. Radloff 的 *Versuch eines Wörterbuches der Türk-Dialecte* (1893-1906, Petrograd) 也不易得到。
3. Sonderausgabe aus de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5, VII.
4. 同上 1938 XX IX。
5. 漢文本有的作“茲” “dzi”，有的作“茲” “tsi”。回鶻文作 tsī，相當於“茲”。本文不能統一起來，因引用材料不同的緣故。

二. 本書譯者

這部書是據漢文本玄奘傳翻譯的。翻譯的人是同鶴別失八里城的一個僧人，名字叫詳古舍利都統 Singqu sāli tutung. 這在本書 23b/16—26^[1] 有記載如下：

ymä	qutluγ	uluγ	twqač	ilintä	
又	幸福的	大	桃花石	國(在)	
üč	ayiliγ	nom	ötgürmiš	huilip	
三	藏	經	洞澈	慧立	
taisi	ödig	alip	twqač	tīlinča	
大師	教	受	桃花石	語文(如)	
yaratmīš	kintsung	wapši	atlγ		
著	彥悰	法師	名		
nomči	ačari	kingürtmiš	o yana	twqač	
宣教	法師	箋	再	桃花石	
tīlīntur	biš	baliq-liγ	singqu	sāli	
語文(自)	別失	把里克人	詳古	舍利	
tutung	yangirdi	türk	tīnlīnča		
都統	重新	突厥	語文(如)		
äwirmiš	bodistw	taito	samtso		
譯	菩薩	大唐	三藏		
ačarin Ning	yoriiγ-in	uqitmaq	atlγ	tsi	
法師的	傳		名	茲	
yn	čuin	tigmä	kwi	nom	bitig.
恩	傳	題名	史傳	經	書

把上文譯出來作：

又幸福的在桃花石國有慧立大師者，洞澈三藏，受教
著爲桃花石文，彥悰法師者宣教法師也，爲之箋。
別失八里克人詳古舍利都統再由桃花石文，譯爲突厥
文，名之曰菩薩大唐三藏法師傳或茲恩傳。

案回鶻文的 twqač 或 twyač 是出於突厥文的 t(a)bq(a)č 或 t(a)by(a)č λχδλ^[2]。長春真人西遊記^[3]的“桃花石”是其對音。都源於“拓拔”一稱。此說始自伯希和^[4]，經補得堡 A. Boodberg^[5]，到巴津 L. Băzin^[6]似已成定論。biš是“五”，baliq是“城”，合言之，則爲“五城”。再加上 liy 則爲“五城人”。五城在今新疆濟木薩附近，唐代已見其名^[7]。慧立和彥悰都是唐高宗至武后時代的人。通慧等編的宋高僧傳^[8]云：“有魏國西寺沙門慧立，性氣無儔，以護法爲己任，著傳五卷，專記三藏自貞觀中一行盛化及西域所歷夷險等，號茲恩傳，蓋取寺題也。及削藁云畢，慮遺諸美，遂藏於地穴。至疾亟，命門徒掘土出之而卒。其本數年流散他所，搜購乃獲。弟子等命悰排次之，序引之。或文未尤，或事稍虧；重更伸明，曰箋述是也”。由此看來，慧立書本五卷，而彥悰增廣成今之十卷，則今本不是慧立的原書了。singqu是名字，sāli tutung是僧官。singqu可譯作“詳古”，sāli tutung可譯作“舍利都統”。都統之爲僧官屢見於吐魯番壁畫題名，及“唐寫經”，如一九二八年三月，西北科學考察團在吐魯番發掘得“唐寫經殘片”，其中有一片，邊上寫的漢字“觀音奴都統所別譯”八字是也^[9]。觀音奴是人名，契丹人作此名的甚多，今知回鶻人亦有作此名的。都統即上述的 tutung。敦煌壁畫題名則多有“都僧統”^[10]的官銜，最初我以爲或即“都統”的異名；但經考查魏書釋老志^[11]及贊寧大宋僧史略^[12]，則“都統”與“都僧統”有不同的來源。魏文帝時，曇曜爲“昭玄沙門都統”，這和“舍利都統”同一意義，“舍利”亦見釋老志，意爲佛骨。“都僧統”，初止爲“僧統”，屬賓沙門師賢、魏封爲“僧統”，後加“都”字，則又表示高了一級。這些官號據僧史略說沿用自南北朝到晚唐，五代與宋皆用“錄”而無“統”；但“偏霸諸道或有私署”。我們現在看到吐魯番和敦煌還有五代和北宋的題名作“都統”及“都僧統”的，或者也因爲“偏霸諸道”吧？詳古不曰回鶻 Uigur文，而曰突厥 Türk 文，因爲二者實是一種語言。“菩薩”爲釋家寂後之尊號，玄奘在印度曲女城大會時，羣衆爲立美名，大乘衆號曰摩訶耶那提婆 Mahāyānadeva，此云“大乘天”；小乘衆號曰木叉提婆 Mokṣadeva，此云“解脫天”^[13]，但此是生前的尊號。慧立書原名茲恩傳詳古譯爲 tsī īn cūin 正與之合。又唯識法相宗自彌勒，無著，天親，護法，戒賢，至玄奘別爲“慈恩教”，弟子窺基光大之^[14]。這也是以慈恩爲傳名的意思吧？

詳古舍利都統這個人的身世我們一點也不知道，只知道他還從漢文的金光明

最勝王經譯成回鶻文。普魯士第三次吐魯番發掘團，曾獲得些殘葉；一小部份經 F.W.K. Müller^[15] 研究過。有以下的幾句話：

ymä	qutluγ	öngtün	uluγ	tvγač
又	幸福的	東	大	桃花石
ilintä	taising	siosing	alqü	šastr-
國(在)	大乘	小乘	一切	論
lariγ	qamaγ	nomlarıγ	qalısz	ötgürü
一切	經	無遺	洞澈	
topolu	bilmış	bošγunmış	bodıstv	
諸	已知	學		菩薩
kitsi	samtso	atly	ačarī	o o änätkäk
義淨	三藏	名	法師	梵
tılıntın	tvγač	avırmış	yana	bu
語文(自)	桃花石(語文)	譯	再	此
kälyük	bulγanyuq	biš	čöbik	
來	混亂	五	濁	
y(a)vlaq	ödtaki	kinki	bošγutluγ	
惡	世	後	學	
bıš	balγ-lıγ	sıngqü	säli	
別失	把里人	詳古	舍利	
tutang	tvγač	tılıntın		
都統	桃花石	語文(自)		
ikilayı	türk	tılınča	aqtarmış	
再	突厥	語文(如)	譯	

把上文重譯出來為：

又幸福的是東邊大桃花石國，於大乘小乘一切經論洞澈無遺，多聞博學的菩薩義淨三藏法師由梵文譯成桃花石文。今生在此混亂五濁惡世，後學別失把里人詳古舍利都統再由桃花石文譯而爲突厥文。

詳古自稱“後學”，可見他漢化的程度不淺。

抄寫茲恩傳的人是不是詳古呢？這很難說。不過，譯文中有時加“十”號，而誤字之傍又另添別字，墨色字體都與本文不一。這恐怕是抄寫後，又經詳古校正了一番。同時字體前後稍有不同，我懷疑這一部書不是一人寫的。前頭許多葉好像和 Müller 的 Uigurica I 後附的圖版一樣。假如還有另外的抄本的話，這部寫本是初本。我說這話是因為金光明最勝王經也是詳古譯的，但至少我知道有兩種回鶻文寫本：一種是古本，第三次普魯士發掘團在吐魯蕃獲得的，一部份載在 Uigurica；另外一種很晚，是康熙二十六年抄寫的，Radloff 得自甘肅翁西谷的山村，一九一三年印為 Bibliotheca Buddhica X VII，凡二冊^[16]。

1. 23b/16—26 表示回鶻文卷第二十三葉背面，第十六行至二十六行。
2. “桃花石人民” トヨス人アヤシタ t(a)b_y(a)c bud(u)n, “桃花石皇帝” トヨス人アヤシタ t(a)b_y(a)c (q)a_yan (W. Radloff: Die Alttürkischen Inschriften der Mongolei. 1895 St. Petersburg, 第一冊，葉一二四)。
3. 長春真人西遊記卷上，葉二五下：“及見中原汲器，喜曰‘桃花石’諸事皆巧。‘桃花石’、謂漢人也”。
4. TP 1912, P: 740 ff.
5. Havard Journal. 1936 P: 167 ff.
6. TP. 1950, P: 228 ff.
7. 舊唐書卷四十，葉三六下“金滿”下云：“後漢、車師後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號五城之地”。
8. 卷四，葉七二八（大正新修大藏經第五十八卷史傳部二）。
9. 今年四月，黃文彌先生和我從袁復禮教授送歸中國科學院的“唐寫經”殘片內，檢出回鶻文殘片大小八種，其中一種邊上寫的這八個字。
10. 史岩的敦煌石室畫象題識只有“都俗統”而沒有“都統”，傅樂煥先生由倫敦帶回的敦煌材料中止有“都俗統”；王重民先生由巴黎帶回來的伯希和手錄敦煌題名照片中也止有“都俗統”；又據向達先生說，敦煌石窟作“都統”的很少見。
11. 魏書卷一百一十四。
12. 大宋僧史略卷中，葉二四三，論僧官頗詳（大正新修大藏經事彙部下）。
13.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五，葉十上。
14. 楊文會：佛教宗派詳注葉三四至三七（民十九丁福保印）。
15. Uigurica. 1908 Berlin. S: 14. Müller 以為 sāli 即 Bretschneider 所說的撒里畏兀兒 Sarī, Uigur 的 sari, 其意為黃。
16. 這兩冊原是陳寅恪先生的，後歸北大東方語文系收藏。一九四八年冬，我得季羨林主任的許可，借來用羅馬字母錄出第一冊中的四分之一。

三. 翻譯時代

詳古舍利都統的生卒年月和慈恩傳翻譯的年代我們都不知道。格瑪麗說洛陽之稱洛京始於九二三(後唐同光元年),沿用至後唐之亡(九三六)。回鶻文本作洛京layki,似乎可以表示本書譯於這個時期,那就是說第十世紀第二個二十五年代^[1]。

這個問題應分四點來說:(一)九二三以前也有稱洛京的;(二)後唐以洛京為定稱;(三)後唐以後也有稱洛京的;(四)詳古誤以洛京為唐唯一的京都。

魏書太和十七年十月戊寅,“詔徵司空穆亮與尚書李沖,將作大匠董爵經始洛京[2]。孟浩然自洛之越詩云:“山水尋吳越,風塵厭洛京[3]。蘇珽唐達樓下夜侍酺宴應制詩云:“東嶽封迴宴洛京,西墉通晚會公卿”^[4]。北魏太遠,突厥且無文字,遑論回鶻?孟蘇俱七八世紀時人,我們知道鄂爾坤河的回鶻人經常用的是一種 runic 文字^[5]而不是這一種文字。或者說古突厥系民族的突騎施 Tūrgiš 人已用這種回鶻文,並有錢幣可證^[6],那末回鶻僧用此種文字譯經,有何不可能呢?我以為一種文字能充分應用,非經相當時日不可,即使這種文字已在應用,但絕不能像詳古那樣運用裕如。

洛陽自古為建都之地,所以有“洛邑”,“東都”,“西都”,“東京”,“西京”,“神都”等等名稱。有時並稱“洛京”,但非定稱。其為政府明令規定,則始於後唐。五代史職方考^[7]說:“梁唐晉漢周以爲都,唐故爲東都,梁爲西都,後唐爲洛京,晉爲西京,漢周因之”。又五代史^[8]本紀同光元年十一月“甲子如洛京”。徐無黨注云:“洛京從當時語”。這說明洛陽雖有諸種稱謂,雖有時作洛京,但其為定稱則始自後唐。

“洛京”雖在後唐為定稱,然後人用它絕不能僅指為後唐的“洛京”;譬如“北京”在國民黨統治下改稱“北平”,然外國人和鄉下人仍曰“北京”,因爲約定俗成,一時不易改變。北宋初年道原編的景德傳燈錄^[9]所載諸僧就多作“洛京”,譬如:

洛京福先寺仁儉禪師 4/224

洛京同德寺幹禪師 4/224

洛京真亮禪師 4/226

洛京佛光如滿禪師 5/245

<u>洛京黑澗和尚</u>	8/256	<u>洛京衛國道禪師</u>	9/264
<u>洛京嵩山和尚</u>	10/273	<u>洛京韶山寰普禪師</u>	16/324
<u>洛京白馬遁儒禪師</u>	17/334	<u>洛京南院和尚</u>	18/353
<u>洛京憩鶴山和尚</u>	18/353	<u>洛京柏谷和尚</u>	23/387
<u>洛京靈泉歸仁禪師</u>	23/389	<u>洛京紫蓋善沼禪師</u>	24/397
<u>洛京興善棲倫禪師</u>	25/407	<u>洛京荷澤神會大師</u>	28/437

傳燈錄用東都,洛陽等名稱的很少,用洛京的却很多。大半年月不可知;但仁儉禪師是唐武后時人,佛光如滿禪師是唐順宗時人。這說明後人用字不見得十分嚴格,常有把現代的名稱用於古地,或者還因為材料的原故,把以前的名稱用於更以前的地方。

可怪的是詳古不以長安爲唐代的首都,而把洛京作爲唐代的首都。在回鶻文本有好幾處可以作證明,如 1a/1:

[qīš]	onurč	əvīn	xan	layki-
冬	第十月	月	汗	洛京
-γa	yrlīqadī	o	samtso	ačari
向	行		三藏	法師
ymā	bardī	o		
亦	去			

案 yrlīqadī 出於 yrlīq-, 或 yarlīγ-, 命令的意思,加上 -γa 變成動詞爲 yarlīγ-qā, 加上 -dī 為過去詞。但 a 和 γ 常省去。這個字表示汗行動的意思,譬如說話,走路等等。譯出來是:

冬十月,汗行向洛京,三藏法師亦去。

可是漢文本原文卷七葉九下是:

冬十月車駕還京師,法師亦從還。

案原文“京師”,無疑的是指長安,有下文可證,而詳古譯作洛京 layki-γa;又加了個 -γa, γa 是與格,就成“向洛京”了。新唐書^[10] 太宗本紀貞觀二十二年,太宗“於十月癸亥(十六)至自玉華宮”。這個玉華宮後改玉華寺,即三藏法師譯大般若經的地方,在陝西宜君北四里。據元和郡縣志^[11] 說此地很涼爽。大概太宗晚年

不大健康，二十二年九月詔^[12]，有“比加藥餌，獨未痊除”之語，二十三年就死了。他去玉華宮是爲了休養，但十月中天氣已寒，不得不返長安。又 7b/9—：

xan	layki-γa	yrliqamış		
汗	洛京	發		
ödtä	anča anča			
時(在)	微			
qia	tapsız-i	bar	ärsär	yal,,,
少	不適	有	雖是	?
xanī	qiridisi	ögi	kögüz-	
汗的	精力	睿	慮	
-ning	isülmädük	ärdi	o	öng,,,
的	不減	是		至?
-ki	bisinč	ay-in	ki	yilan
	第五	月	已	巳(蛇)
kün-kä	anča anča	baš,,		
日(於)	微	頭		
aγriqandī	o	anī	üçün	samtso
痛		故		三藏
ačariγ	qodup	ordu-ta	t,,,	
法師	留	宮中(在)	宿?	
duči	o qī	yont	kün-kä	xa[n]?
	庚	午	日(於)	汗
tngri	bultī	„ölang	iñiliq-ta (o)	
神	變爲	含風	殿(在)	
tngri	bulmış-in	kiz-lädi		
神	變爲	祕		
yanturu	layki-γa	iltip o		
還	洛京(於)	領		

譯意爲：

汗發洛京時，雖微有不適，而汗精力睿慮不減。至五月己巳日，微頭痛，故留三藏法師宿於宮中。庚午日，汗在舍風殿變爲神，變爲神之事祕而不宣，領還洛京。

再看一下原文是：

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無減平昔。至五月己巳微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帝崩於舍風殿，時祕不言，還京發喪。

試看“帝發京”，詳古譯爲 *xan laγki-ya yrlıqamış*；“還京”譯爲 *yanturu laγki-qa*，就變成“帝發向洛京”，還“洛京”了。案新唐書太宗本紀^[13] 貞觀二十三年“四月乙亥幸翠微宮”。大概此時太宗已病，所以傳說“微和”。翠微宮、新唐書^[14] 地理志說在長安南五十里有太和宮，武德八年置，貞觀十年廢，二十一年復置翠微宮。太宗有病，因爲長安四月已熱，所以去長安不遠的翠微宮休養。如是洛京，那離翠微宮太遠了。恐怕太宗未必願長途勞頓！又 106a/1—8：

bu	ülüs-tä	hinki	atly . . .
此	卷(在)	顯慶	名
yıl-nı̄ng	üčünč	yılinta	äräm ay samtso
年的	第三	年(在)	正 月 三藏
ačarı	xan	birlä	laγki-din
法師	汗	同	洛京(自)
čoo	an-qa	barmışdın	
長	安(于)	行	
bašlanur	o		
始			
„ latı	lintiγ	atly	yıl-nı̄ng
至?	麟德	名	年的
bašlaqı	yıl-ınta	ikinti	[ay]
元	年(在)	第二	月
yüγ	xua	kung	atly q̄ . . . o o
玉	華	宮	[捨化]

譯出來爲：

在此卷內，始於顯慶三年正月三藏法師同汗自洛京去長安。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漢文原文爲：

起顯慶三年正月隨車駕自洛還西京。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試看原文作洛，而詳古譯作洛京 layki，西京則譯爲長安 coo an。這和前頭三次稱“京”的地方結合起來看，無疑的詳古是把洛京誤作爲唐代唯一的首都了。

總之：詳古以洛陽作洛京不能證明詳古譯於後唐時代，因爲北宋人編的傳燈錄仍然作洛京。詳古如是十世紀初年的人，距回鶻西遷不過幾十年的光景，唐代的長安對回鶻人是如何的重要，他似乎不應當弄錯。同時詳古用字十分廣泛，文辭很美麗，八四零年回鶻西遷後，非經一段長的時期，不能有這樣豐富的語彙。因此，我不能贊同葛瑪麗所說本書譯於後唐，我以爲譯於北宋或較合理。不過，這個問題須待把全書仔細研究後，和其他已知道年代的材料比較後，才能作最後決定；今所說僅是一種假定而已。

1.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Sonderausgabe aus den Sitzungsberichten der Preussischen Ac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 Klasse. 1935, VII, p: 4-5.
2. 魏書卷七下，葉十六下至十七上。
3. 欽定全唐詩卷六，葉二十二上。（光緒丁亥上海同文書局石印）。
4. 同上書卷三，葉三上。以上這兩條是丁惟粹先生查出來告我的。
5. 參看 G. J. Romstedt: Zwei Uigurische Runeninschriften in der Nord-Mongolei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ugrienne XXX, 3. Helsinki 1913) 共六十三面，後附 runic 文字殘碑，考證極詳。
6. F. W. K. Müller: Uigurica II, (Berlin 1911). p: 95. 錢幣如唐開元錢，紅銅質。有四字爲：tūrgiš Xaγan bai β̄i 或 β̄i tūrgiš Xaγan bai 莫賀突騎施可汗 bai β̄i。
7. 五代史卷六十，葉十七上。
8. 五代史卷五，葉六下。
9. 大正新修大藏經史傳部三 2077。
10. 新唐書卷三，葉十一下。
11. 元和郡縣志卷四，葉五上（武英殿聚珍版叢書）。
12. 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七，葉八下。
13. 新唐書卷三，葉十二上。
14. 新唐書卷三七，葉二下。

四. 回鶻文略說並論本書的譯文

回鶻文字起源，說各不同，但以出自粟特文 *sogdien* 的說法為最有力。往年拉德洛夫 W. Rodloff^[1] 曾將回鶻字母與敍利亞字母比較研究，主張回鶻文字是出自敍利亞文。他並說七八世紀景教徒用敍利亞文，因為景教徒傳教於東亞，遂將此種文字傳於東亞。回鶻人頗信景教，乃據敍利亞字母而創製回鶻文字。但同時有繆勒 F. K. A. Müller^[2] 則持不同的見解，他據九姓回鶻可汗碑一種新文字的殘字與新發現的粟特文殘片比較研究，發現可汗碑的一種新文字乃是較回鶻文古的一種文字，即粟特文。他並說回鶻文乃是據粟特文創製的。其後勾求 M. R. Gauthiot^[3] 更引申之，說粟特語言屬伊蘭系，文字乃與敍利亞文同出一源。粟特語沒有 b, d, g 銳音，而只有 β, δ, γ 鈍音；回鶻文則已有 b, d, g 銳音，而無 β, δ, γ 鈍音。粟特字母被採用後，即與回鶻語發音發生不調和的現象。我覺得他的話很對，無怪乎回鶻字母中有 b, p, 不分；g, k 不分；t, d 雖分，但常互用等這些事實。

九姓回鶻可汗碑是用三種文字刻的：一種是古突厥文，一種是粟特文，一種是漢文。粟特與突厥文部份殘破不堪，略知其為關於摩尼教奉行的事實。我覺得回鶻可汗碑而用粟特文記載，必有特別的原因。除說明回鶻貴族信仰摩尼教外，我覺得這還說明回鶻文字採自粟特文的原故。縱然現在我們還沒有獲得有力的證據，說回鶻語言在鄂爾坤流域時代已然有用粟特字母傳寫的事實；但由于突厥系其他部族錢幣的發現，以及後日蒙古初期用回鶻字母傳寫蒙古語言的例子，不得不令人聯想回鶻人在未西遷以前也有用粟特字母傳寫回鶻語言的可能。

回鶻西遷後的初期，古突厥文大概還在用，試看拉德洛夫^[4] 在 Yarkhotun 石刻找見的兩句話，就是用這種文字寫的。後來逐漸廢棄，以粟特字母創製的文字才作了回鶻人唯一的文字。十世紀以後，回教盛行於南疆，因此南疆的回鶻人先採用了亞刺伯字母。試看今日留存的 *Mahmūd al-Kašyarīs Dīvān Luŷāt at-Türk* 是十一世紀的產物，就是用亞刺伯字母傳寫回鶻語言的。什麼時候這種據粟特字母而製的文字不用了呢？這很難回答。我們知道明代高昌館來文還是在用它，甚至康熙二十六年還有僧人在甘肅僻靜的古廟裏，用這種文字把金光明最勝王經的

回鶻文譯本重抄了一遍。換言之，十七世紀時，這種文字還在半死半活，深山古廟裏的回鶻後裔還有懂得的。自此以後，無人睬理，就變成死文字了^[2]。

回鶻文源於粟特文，滿蒙文又源於回鶻文；但滿蒙文已定型化，字母分別甚晰；回鶻文則是據伊蘭語系的粟特文創製的文字，字母分別不甚明晰。a, ä 在字頭上有別，中間無別，且與 n 相混。o, u 無別。ö, ü 無別。b, p 無別。k, g, h 無別。i, y 無別，與 w 易相混。d, t 有別，但常互用。q 前有兩點，x 有一點，γ 無點，s, š 無別，z, ž 之別在後者加兩點；但有時不拘。z 或 ž 和 r 起頭不用；有時用，則是用於外來字。要之，此種文字既未定型化，在研究時要靠體會與經驗，不能與活文字一概而論。

回鶻語言一如其他阿爾泰語言，是一種黏着語言。母音分寬窄：a i o u 爲寬音，ä i ö ü 爲窄音，y 爲半母音。在一字的組織上，後邊母音須追隨前邊母音，譬如 bir 是“一”，加上動詞語尾 -lä 為 bir-lä，是“在一塊兒”的意思；但不能作 bir-la。所以在標音上也必須遵守這個法則。

回鶻文法也相當複雜，格瑪麗^[5] 把名詞定為六格，蒙格斯 Menges^[6] 定為九格，我覺得蒙格斯的詳盡可用，其次序如下：

1. nom.	qut	福	
2. gen.	qut-nïng	福的	-nïng, -ning -nüng, -nung.
3. dat.	qut-qa	於福	-qa, -ka, -kä.
4. accus.	qut-iγ	把福	-iγ, -iq, -ig.
5. abl.	qut-dïn	自福	-dïn, -din, -tin, -tïn, -dan, -dän.
6. loc.	qut-da (dan)	在福	-da, -dä, -ta, -tä.
7. aeq.	qut-ča	照福	-ča, -čä.
8. comp.	qut-tag	似福	-tag, -täg.
9. instru.	qut-in	以福	-in, -in, -ün, -an, -än.

不過，有時候，7 和 8 很難分別。其他品詞今不贅述，當另詳說。

茲恩傳卷六以後，儘是些詔、勅、序、表之類，文為四六，字多冷僻。我們現在如果把這些東西譯成白話文，也不容易，何況詳古是個回鶻人？原來他的漢文根底很好，他除翻譯過這部書外，還譯過金光明最勝王經。回鶻文茲恩傳殘片 206 b 寫的“乾坤……”幾個漢字極工整^[7]，如果不是抄寫經的人寫的，而是他自己寫的，